



— ■ 文人轶事 ■ —

胡适批“麻将”

胡适早年热衷打麻将，而且牌瘾颇大。1911年七八月份，胡适正在美国留学，他在日记中曾记录了自己的“麻将生活”：周一注册学籍并打牌，周二上化学课并打牌，周三上课并打牌……若是遇上休息日，更是通宵达旦打麻将，耗费了大量宝贵的读书时间。他在日记中写道：“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胡适之啊胡适之，你怎么如此堕落……”

1926年7月，胡适赴英国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全体会议”。他从北京出发，经哈尔滨、西伯利亚，抵达欧洲。会议结束后，由美洲到日本最后回国，前后历时10个月。胡适一路游历，将沿途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写成一篇文章《漫游的感想》，其中，第6为“麻将”。胡适落笔便指出，1920年初，麻将风靡欧美，成为西方社会最时髦的一种游戏：“俱乐部里差不多桌桌都是麻将，书店里出了许多研究麻将的小册子，中国留学生没有钱的可以靠教麻将吃饭挣钱。”

然而，此番游历除了“一次在日本京都的一个俱乐部里看见有人打麻将牌，在欧美简直看不见麻将了”，胡适惊奇地发现，麻将已成了西方人“架上的古玩”，鲜有人问津。他不由得感慨：“西洋的勤劳奋斗的民族决不会做麻将的信徒，决不会受麻将的征服。麻将只是我们这种好闲爱荡、不爱惜光阴的‘精神文明’的中华民族的专利品。”进而痛言：“我们走遍世界，可曾看见那（哪）一个长进的民族，文明的国家，肯这样荒时废业的吗？”“只有咱们这种不长进的民族以‘闲’为幸福，以‘消闲’为急务，男人以打麻将为消闲，女人以打麻将为家常，老太婆以打麻将为下半生的大事业！”

《漫游的感想》带有浓厚的时代印记，尤其是“麻将”一则中，胡适在言语之间让我们看到他对国人身上长期存在的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消闲之态倍感痛切，对国家前途的担忧、对“国粹”麻将的深恶痛绝，以及渴望重建东方文明的迫切愿望。（据《人民政协报》）

谁也不怕谁的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近些年来，学者们从各种角度对西南联大的成功进行了总结，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有一方面却为大多数人所忽视了，就是联大时期，老师与老师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老师与学生之间，在为人处世方面所拥有的坦诚心态。

著名学者王浩当年曾就读于西南联大，回忆往事的时候，王浩把在西南联大度过的时光称为“谁也不怕谁的日子”：“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不论资历和地位，可以说谁也不怕谁……开城布公多于阴谋诡计，做人和做学问的风气是好的。”

“例如在课堂上，有些学生直言指出教师的错误，而教师因此对这些学生更欣赏。有两次教师发现讲授的内容有严重错误，遂当堂宣布：近几个星期以来讲得都不对，以后重讲。教师与学生相处，亲如朋友，有时师生一起学习材料。同学之间的竞争一般也光明正大，不伤感情，而且往往彼此讨论，以增进对所学知识的了解。”

“离开昆明后，我也交过一些朋友，但总感到大多不及联大的一些老师和同学亲近。这大概和交识时的年龄有关，但我觉得当时联大有相当的人在为人处世上兼备了中西文化的优点，彼此有一种暗合的视为当然的价值标准。”

当年，在西南联大师生中流传着这样一副对联：“如云，如海，如山；自如，自由，自在。”这副对联，让我们看到了联大的开明学风和旷世风采。“谁也不怕谁”并不是彼此不尊重，而是在为人处世方面拒绝权威、平等相待，人人与人之间，处于这样一种宽松、和谐的氛围中，可以充分发挥自己，因此在艰苦的环境中，也能创造出灿烂的学术业绩。（据《联谊报》）

钱穆上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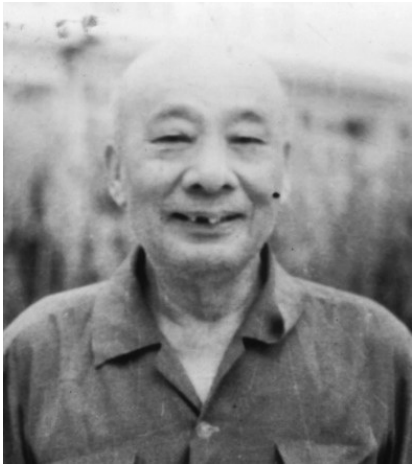
著名史学家钱穆给小学生、中学生和大学生都讲过课。他的课堂精彩纷呈，时有妙语，常常逗得学生笑声不断。

有一次，他给小学生上作文课，强调“作文就是说话，口中怎么说，笔下就怎么写”，并出了作文题目《今天的午饭》。作文交上来之后，钱穆认为有一篇写得比较好：“今天的午饭，吃红烧肉。味道很好，可惜咸了些。”他以此为例，告诉学生作文要曲折、要有韵味。最后一句“可惜咸了些”就很有意思，有了它，作文则显得与众不同。

后来，钱穆到北京大学讲中国通史。讲课时，他穿一件发旧但干净的蓝色长袍，喜欢左手执书本，右手握粉笔，一边讲，一边从讲台的这端踱到那端，周而复始。钱穆善于言辞，长于演讲，讲到紧要处，像与人争论一样，高举双臂，慷慨激昂；讲到高兴处，又巧妙譬喻，妙语连珠。比如讲到中西文化的异同时，他将秦汉文化比喻成室内通悬的万盏明灯，即便打碎一盏，其余犹亮；而将罗马文化比作一盏巨灯，熄灭了，就一片黑暗。对于这样的比喻，学生听得记得住。

由于听钱穆讲课的人太多，学校不得不将他的课堂设在北大梯形礼堂，面积是普通教室的3倍。每一堂课，听讲者将近300人，坐立皆满。更为夸张的是在西南联大时，钱穆上课的时候，教室过道都挤满了学生。钱穆“无路可走”，需要踩着学生的课桌才能走到讲台上。而在香港新亚学院时期，每当有钱穆的讲座，校内外赶来听课的学子人满为患，钱穆必须拨开人群，“开辟道路”，才能上台讲课。（据人民政协网）

陈养山：被称为隐蔽战线的“福将”



陈养山。

在恽代英影响下参加革命

陈养山，原名程仰山，1906年出生于浙江省上虞县。其父程步青，晚清秀才，兼事中医。陈养山在小学读书期间，因家境贫寒，未毕业即被迫退学。1919年，他到汉口市一家钱庄做学徒。

1919年前后，中国社会急剧变革，各种思潮风起云涌。陈养山怀抱“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理想，认真学习钱庄业务，并积极利用零碎时间阅读了大量书籍。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爆发，使陈养山认识到反抗旧秩序的可能性和意义。1924年初，陈养山接触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被革命理论吸引，遂与志同道合的店员同事组成学习小组。在学习革命理论的过程中，陈养山尤其喜欢恽代英的文章，就写信给恽代英，谈自己读书学习的体会与困惑。恽代英很快给陈养山寄了明信片，并约其到家中会面。对此，陈养山曾回忆说，“那天天气很热，我们从上午10时许，一直到下午4时，会谈持续了6个多小时”“当时我提出一大堆问题，请教代英同志，他都作了耐心的解释”“我记忆最深的是，他说中国革命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要建立苏联式的政府，人民才能得到解放”。这次会谈深深地影响了陈养山，在他心中埋下了革命的种子，奠定了其终身革命的思想基础。此后，陈养山一直视恽代英为良师益友和自己走向革命道路的引路人。同年10月，陈养山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于192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4月底，青年团武汉地方委员会书记林育南派陈养山送密信到上海团中央。从此，陈养山开始迈入革命生涯。

掩护贺龙

1925年5月，陈养山抵达上海，恽代英安排其担任团中央交通员，和团中央书记任弼时一起，参加了五卅运动。随后，团中央派陈养山赴湖北武汉工作，因熟人太多，秘密工作不易开展，团中央又将其调回上海，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上海交通局工作，担任发行科科长。其时，广州的进步书刊多由海员工会会员秘密携带至上海，再从上海邮寄至全国各地。陈养山在同海员工会会员密切接触中，积累了社会关系，为此后开展情报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26年春，组织上交代陈养山运送几枚炸弹到武汉中央军委。陈养山通过认识的海员，搭乘英国货轮，完成了任务。这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印象。

1926年冬，陈养山被调到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做统战工作。“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陈养山在浙江杭州难以立足，赴上海寻找党组织，几经周折接上关系后，他被任命为上海法南区委宣传部部长。1927年11月，贺龙秘密来到上海。为了确保贺龙的安全，周恩来提议由陈养山承担掩护贺龙的任务。陈养山将贺龙、周逸群安排在一个秘密住所里，1928年1月，陈养山又秘密安排贺龙等人奔赴湘西。多年以后，贺龙对陈养山的工作依然赞赏有加。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

时，贺龙谈到情报工作重要性时说：南昌起义以后，我到了上海，就是通过特科，具体说是通过陈养山同志安排，把我隐蔽在上海后又秘密运送到洪湖的。我亲身体会到，你们的工作，再花多少钱都是值得的。

在中央特科的特殊工作

1927年，中共中央在上海建立中央特科，由周恩来直接领导，从事情报和保卫工作。1928年，国民党中央在组织部内设立党务调查科，即后来的“中统”。当时，上海党组织全部转入地下，陈养山完成掩护贺龙的任务后回到浙江上虞。1928年春节后，因组织农民暴动失败，陈养山潜回上海，住在鲍君甫家，并在一家报馆谋生。

鲍君甫，又名杨登瀛，18岁赴日本留学，回国后在日本人办的基督青年会做事。1925年底，陈养山经人介绍与鲍君甫认识，且向鲍君甫学习日语。陈养山作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上海交通局发行科科长，经常将书报送给鲍君甫。鲍君甫将其译成日文，所获颇丰，两人遂成好友。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成立后，时任调查科总干事的杨剑虹和鲍君甫是老乡，他邀请鲍君甫加入。鲍君甫心里很矛盾，既想为国民党做事，又不愿得罪共产党，他便将这种矛盾心理坦诚地告诉陈养山。据陈养山回忆：“1928年三四月间，鲍君甫告诉我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即‘中统’）的总干事杨剑虹，要他当侦探，做破坏共产党的工作。鲍君甫想去国民党做官，又想靠拢共产党，问我怎样才能两全其美？我考虑他是国民党左派，对我党有一定的同情，可以争取利用。”于是，陈养山连夜将情况写成材料，经过中共闸北区委向党中央报告，建议同鲍君甫建立工作关系。

周恩来仔细研究了陈养山的报告，认为鲍君甫虽在政治上不可靠，但在隐蔽斗争中非常重要，有利于中央特科工作的开展。周恩来指示陈康了解相关情况。陈康先约陈养山谈话，详细了解鲍君甫的情况；接着又同陈养山与鲍君甫面谈。陈康认为鲍君甫同情革命，在白色恐怖中能和中国共产党朋友融洽相处，可以作为内线。经过中共中央谨慎考虑，同意鲍君甫为党工作。为了方便陈康工作，周恩来将陈养山调入中央特科，由陈康单线联系，并派中共党员连德生作为鲍君甫的保镖。

在中央特科的协助下，鲍君甫颇得杨剑虹、陈立夫等人的信任。1928年8月，杨剑虹涉及贪污案自杀。10月，鲍君甫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上海特派员。鲍君甫与中央特科密切配合，在铲除叛徒、保卫党的机关和营救被捕同志中起到很大作用。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中共中央立即派陈养山对鲍君甫作了气节教育，并称：不管形势怎么变化，共产党是不会忘记你这个朋友的。鲍君甫入狱后，三缄其口，没有暴露共产党的秘密。

中央特科对鲍君甫的工作是成功的。从根本上讲，这归功于中央的领导、组织和协调。但陈养山凭借高度的政治敏感和对党组织的责任感，向党中央提供材料和建议，也功不可没。

辗转于天津、重庆等地开展秘密工作

1931年初，中央特科准备在北方开展工作，秘密情报关系是北洋军阀时期的国会议员胡鄂公。胡请求杨献珍为其助手，得到中央特科的同意。4月，顺直省委遭到破坏，安子文、周仲英、刘亚雄、陈原道等被捕。6月，中共中央命陈康、陈养山赴天津营救被捕同志，并调查叛徒的情况。陈康和陈养山化装成商人，住在交通旅社，半个月后两个人和杨献珍接上关系。陈康和

陈养山在交通旅社住了个把月，恐久住惹人怀疑，陈康住进一所新出租的民房；陈养山搬到大同公寓，与杨献珍同住，协力进行营救工作。一天清早，杨献珍在报纸上看到河北省委互济会被破坏的消息，赶紧告诉陈养山。陈养山果断撤离，并通知陈康，避免了危险。杨献珍到北平找刘少白商议营救同志的事情，不幸被捕，营救工作被迫停止。随后，陈康、陈养山将工作重点转向清查叛徒。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陈康和陈养山掌握了一批叛徒的姓名、特征、住处、来往关系、活动规律，决定立即回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建议派“打狗队”镇压叛徒。半个月后，陈养山同中央派遣的“王老头”再赴天津。8月，天津最大的叛徒张克云被击毙。

8月下旬，天津党组织有个姓鞠的党员和陈康取得联系，陈养山与其住在一起。9月初，陈养山让老鞠去买报纸，本来只需10分钟，但天黑也没回来。陈康到后，两人判断肯定出了问题，于是陈养山马上撤离。第二天，在天津同志处得知老鞠已经被捕。鉴于这种情况，陈康和陈养山在天津已经很危险，决定返回上海向党中央汇报。

这时，受“左”倾错误的影响，我党在白区工作遭到破坏。1935年8月，上海临时中央局停止工作。中央特科的干部也作了疏散，陈养山拟派往苏联学习。临行前，由于四川情报工作有所进展，陈养山被派往重庆。到重庆后，陈养山经过详细调查，得知四川工作基础很好，10月返回上海向党组织汇报情况，联系人邱吉夫同意派人去重庆，但经费无法解决，让陈养山等待。11月上旬，邱吉夫突然被捕。几经周折，12月中旬陈养山接上关系，与陈克寒同往四川。陈昌、陈养山和陈克寒接办四川实力派创办的新四川通讯社，以此为掩护，周旋于各派势力之间，开展情报和统战工作。经过数月努力，陈养山等人获得大量军事、政治、经济方面的情报，如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军阀的党政军动向的情报；军力配备及互相斗争的情报；国民党军部和党部与地方各派系之间争权夺利的情报；各种社会情报等。1936年7月，陈养山回上海向党组织汇报重要军政情报，在准备返回四川之际，中共中央决定派陈养山到陕北学习。9月，陈养山抵达陕西西安，在西安情报站从事参与联络西北军的工作。陈养山以西北文化日报社记者的身份作掩护，从事情报和统战工作，交了不少朋友，获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得到党中央较高的评价。

1940年6月，陈养山回到延安，结束了16年的敌占区情报生涯。其间，陈养山辗转于湖北武汉、上海、天津、重庆、四川成都、陕西西安等地，从未被逮捕过。罗青长认为：这并非他有什么诀窍，而是由于他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正确的政治方向，灵活的斗争艺术和严格的组织纪律观念。

在晋绥做情报工作

回到陕西延安后，陈养山担任中央社会部情报干部训练班班主任。1942年2月，陈养山在中央党校参加整风运动。通过学习，陈养山的理论水平得到提升。1944年底，中央情报部根据贺龙的提议，派陈养山担任晋绥军区调查局局长。

1941年8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9月，中央情报部成立。12月，晋绥边区成立情报委员会。晋绥军区情报处的任务是收集敌伪军事情报、战略情报和瓦解伪军。1942年6月，晋绥军区情报处扩大为调查局，1943年向敌占区城市派出18名情报骨干。1945年1月，晋绥军区调查局移交给中共晋绥分局领导。

1945年1月，陈养山一行抵达晋绥调查局时，原正副局长已返回延安，大部分干部

《中国工农红军誓词》见证首个建军节

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内，陈列着一份1933年中革军委颁发的《中国工农红军誓词》。《中国工农红军誓词》为竖排铅印版，长21.8厘米、宽19.5厘米，毛边纸质，呈灰褐色。1954年，瑞金革命纪念馆筹备处从当地群众手中将其征集入馆。这份誓词是八一建军节诞生和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壮大的重要历史见证，也是人民军队历史上首次正式颁布的革命军人誓词。

1933年6月30日，中革军委决定，以南昌起义的8月1日作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

根据中共临时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中革军委的指示和决定，红军各部队、苏区各级政府 and 广大群众积极准备开展纪念“八一”活动。为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加强全国军事指挥和军事建设，中

革军委从前方迁至瑞金，精心组织筹备纪念日的各种活动。

此时，国民党军正在加紧筹划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为鼓舞红军士气，加强打破敌人“围剿”的信心和决心，中革军委在纪念日活动中安排了宣誓仪式，并着手宣誓词的编撰工作。7月27日，中革军委颁发《中国工农红军誓词》。28日，中革军委发布训令指出：“本委员会制定中国工农红军誓词，以备八一纪念日及成立红军部队举行宣誓之用。各级指挥员必须负责详细讲解，使每一个红军军人都能彻底了解和遵守为要。”同时，中革军委还印制了大量誓词发放给苏区军民，进行广泛宣传。

8月1日，人民军队历史上的首次八一建军节庆祝活动，在瑞金城南炮兵广场举行。阅兵之后，全体官兵跟着朱德总司

令齐声庄严宣誓：“我们是工农的儿子，自愿来当红军，完成苏维埃给我们光荣任务，为着工农解放奋斗到底。我们是红色军人，要保证自己和同志们绝对遵守和服从苏维埃的一切法令，并以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做模范，努力学习政治军事，爱护工农的利益和自己的武器，使他不遭损害和窃夺。我们是苏维埃柱石，誓以我们血与肉发展民族革命战争，实行土地革命，推翻国民党，保障苏维埃，打倒帝国主义，争取中国解放，武装拥护苏联，完成民主革命，为社会主义前途斗争。现在敌人正在大举进攻，我们要团结一致，拿我们刺刀和枪炮与敌决一死战，拿我们头颅与热血，换得苏维埃新中国。我们为着阶级利益遵守革命纪律，服从上级命令，如若违犯和不忠实甘受革命纪律制裁愿听同志指斥。谨誓。”

铿锵有力的誓言响彻云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像是沉重的鼓点，敲打在红军战士的心头。《中国工农红军誓词》充分体现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初心本色，彰显了红军将士坚定的政治立场和不怕牺牲、英勇顽强的革命气概。宣誓完毕后，中革军委为授奖人员颁发“八一”红星奖章，并为红军各部队授予荣誉战旗，以嘉奖功绩激励士气。

在当时国民党军大肆“围剿”的历史背景下，红军举办这样一次大规模纪念活动，起到了相当大的鼓舞作用。尤其是《中国工农红军誓词》的颁布，使得红军官兵和苏区群众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热情空前高涨，也激励了大量革命青年加入子弟兵队伍。自此，每逢重大集会、战前动员等时机，红军部队都要重温誓词，以鼓舞士气、凝聚力量、增强信心。（据《中国国防报》）